



中共党史论集

郭仁公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7-33
DH/88/26

中共党史论集

郭德宏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及重要事件、会议、人物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党史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海陆丰等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经验教训，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王明等人的评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有关问题的探讨，以及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等。在很多问题上，本书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中 共 党 史 论 集

郭德宏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中国农机化报社山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5印张 26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036-116-0/D·19 定价：5.30元

目 录

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1
目前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2
如何看待党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25
关于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	36
六大以前党中央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55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 及经验教训·····	7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	92
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与红军的战略方针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	113
喜读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	126
黎平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纪念黎平会议召开50周年·····	135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	142
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151
王明在长江局·····	175
永垂青史的爱国之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	191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8
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	214

罪恶昭彰，祸国殃民	
——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230
封建主义的复辟及其教训——对于林彪、“四人帮”	
复辟封建主义的思考……	241
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	
——评“四人帮”的儒法斗争史观……	25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	267
关于毛泽东思想等问题答读者问……	283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297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12
我们伟大祖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325
论我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	337
中国政党发展概述……	351
后记……	359

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 与科学性的关系^{*}

党史是直接研究党的历史的，直接为党的事业服务的。与历史学的其他部分比较，它的党性特别鲜明和突出。因此，如何处理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在党史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

—

很多同志已经多次指出，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完全是统一的，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科学性离不开党性，只有增强党性，公开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不断加强科学性。这是因为，每一个人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以往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虽然也多主张历史要真实，要写出“信史”，但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的真象。孔子著《春秋》，就明确主张“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 本文系与李明三同志合写。

这样一隐讳，当然就难以做到科学了。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各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类的未来，它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一致的，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因而最大公无私，最敢于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决定了它最需要科学性。只有符合科学性的东西，也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此其一。其二，历史研究总是以一定的思想作指导的，不以这种思想作指导，就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以另一种思想作指导。而在各种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真理。我们的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党史研究要做到科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性也离不开党性。

第二，党性离不开科学性，它以科学性为基础，并体现在科学性之中。所谓科学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真实，即周恩来在谈到撰写文史资料时所说的，要“存真，求实”，“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不真实，当然就谈不上具有科学性。二是必须从事实出发，找出党史发展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历史学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党性的表现。这是因为，历史是要人看的，是为党、为人民提供借鉴，向全体党员、全国人民进行教育的。如果不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实，人家就不相信，不愿看，就起不到启发人、教育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口号叫得多响，也是空的。如果以加强“党性”为借口，压制和否定科学性，任意篡改、涂抹党的历史，那就不但对党无益，而且有害，会使党的威信降低。同样，如果不能从事实出发，进一步找出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使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快地前进，也不能更好地为党的事业服务。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也就是说，离开了科学性，就谈不上完全的、真正的党性。

从理论上讲，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是如此。但是在实际的党史研究中，由于对党性、科学性或对二者关系的不正确理解，却往往容易使二者相背离。前些年，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史研究中曾长期存在抬高所谓“党性”，忽视甚至压制科学性的实用主义偏向。为了服从于所谓的“党性”，党史被不断的改来改去，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今天这样讲，明天又那样讲。林彪、江青一伙曾公开叫嚷，党史研究的方针就是“参考历史，重在为现实服务”，说什么“我不是玩古的，我是要实用的”，“我们就是搞实用主义”。在他们那里，一部党史被歪曲、涂抹得不成样子，党史研究完全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这样的党史，当然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了。广大党员、群众把它斥之为“假党史”，不屑一顾，完全是正确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党史研究在党员、群众中的威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但是，实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1966年横排本。

用主义的影响并不是一点都没有了。李维汉1980年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在一些纪念文章、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作品中，不同程度的拔高、编造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党史研究中继续注意肃清实用主义倾向的影响，继续强调加强科学性，还是非常必要的。

除实用主义的倾向之外，忽视甚至否定党性的客观主义倾向，也是应该注意防止的。客观主义，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向来标榜的一面旗帜。他们认为，公开地站到一定的政党的立场上，就会妨碍科学性，应该“浩然独立，无所偏党”。事实上，在有阶级或政党存在的社会里，要“浩然独立，无所偏党”，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们自己，也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对于客观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区别，列宁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可见，“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①。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只有“客观”记述的历史才是科学的。有的同志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定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与这种思想的影响不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深入开展党史研究的过程中，继续强调加强党性原则，也仍然是十分

^①《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必要的。

二

那末，应该如何处理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以前，史学界曾提出过“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提出来，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纠正历史研究脱离政治的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全面的，容易引起误解，在实践上也确实带来了不少弊病。于是，如何处理同现实政治的关系，成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关于如何处理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胡乔木同志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重新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它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一向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从来不说也不可能说人民为政治服务，那就颠倒了主从关系，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脱离政治，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特定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的要求协调一致。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以此为借口，去违背、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

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②。党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上述原则同样是完全适用的。

首先，应当明确党史研究为党的利益服务，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是为全党、全阶级和全体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而不仅仅是为政治服务。党既是领导人民前进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党的利益服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人民服务。同时，党领导人民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多方面的，党史研究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内容和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例如通过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手段，协助党从党的历史中，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客观规律，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加以掌握和运用，取得行动的自由；具体阐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和规律，使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以后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教育全体党员、全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鼓舞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远大目标而奋勇前进，等等。这些任务，并不是“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所能包含得了的。因此，不应再提历史研究包括党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

同时，还应当明确党史研究决不能脱离政治，必须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党史研究虽然研究的是历史，但总是着眼于当前的各种实际需要的。很难想象，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可以脱离现实的政治。有的同志认

^②《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37—38页。

为“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这是不利于党史研究的开展的。一个党史工作者，不能没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这是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党史研究中加以维护和坚持，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事实证明，远离政治，脱离现实，党史研究就会走偏方向。

第二，正确处理党史研究和党的决议以及党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著作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党史上有些问题，决议一作，领导人一讲，定了调子，就不好研究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有的同志就认为这给党史研究划定了框框，有些问题不好讲了。我们认为，党的决议以及党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他们的著作，都是不同范围内经过反复讨论产生的，都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全党的认识水平，对于正确评价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花了整整20个月的时间，在不同的范围内反复进行了讨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是别特件“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对于研究建国32年来党的历史以及整个党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以它作为党史研究的指针，是完全正确的。

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来说，党史工作者也必须遵守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党的决议一经党的会议通过，就对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约束力，不允许党员不遵守党的决议，不允许公开宣传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这是党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和党的理论工作者都是必须遵守的。没有这样的纪律，革命事业就不能胜利，不能前进。胡耀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指出：我们的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和党员思想理论工作者，时刻也不要忘记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这个家、那个家。这个精神，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完全适用的。

但是，党的决议并不会阻碍、也不能代替党史的研究。党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和他们的著作，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党的决议以及党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和他们的著作，虽然十分重要，但一般说来，毕竟只是对一些大的原则问题，对一些总的指导思想发表的意见、作出的结论，不能也不可能对党史上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具体、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即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主要是对建国以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并没有对32年来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都作出详尽的分析，不少问题还只是概括地作出了总的论断和结论。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决议》的精神为指导，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决议作出充分有力的说明。

其次，党的决议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和著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它虽然力求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和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思想，代表当时的正确意见，但是，从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

律来说，它只是完成了这一艰巨工作的长链条的某些环节，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历史的发展规律，认识所有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要使党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前进，使党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就必须对一些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允许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有组织地进行讨论。

其三，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来说，也并不妨碍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胡耀邦同志1980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讲组织性、纪律性，并不妨碍或者排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是保障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在党史研究中也是这样，遵守党的决议也不会妨碍深入的科学研究。相反，党的每一项决议作出之后，党中央都一再提倡在决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的、艰苦的研究工作。

总之，党的决议和党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及他们的著作，既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准则和指导，又是继续对它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它既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应该在深入的科学研究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当然，对于它的研究和讨论，应该根据党的纪律和原则，根据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和程序来进行，而不应当不加区别地对什么问题都作公开的宣传和讨论。

第三，正确处理史料的考证、具体问题的细致研究与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的关系。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对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辨伪等细致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认为一些细致的考证没有多大意思。历史是靠事实说话的，没有丰富的、确凿的材

料作依据，对历史问题就说不清楚，说出来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党史研究要做到科学，就必须搜集和掌握大量的、全面的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反复的考证，使之做到真实、准确。马克思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党史上有些问题多年来讲不清楚，或讲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对资料搜集、掌握得不全，研究、考证得不细。在公开宣传中，有些问题当然不能讲得太细，但在研究工作中，却必须强调细致的作风。

当然，我们强调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细致的研究、考证，并不是说事无巨细，都要花同样的气力。有的同志认为研究的问题越小越好，越偏越好，考证的问题越细越好，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只是一种“空论”，也是不恰当的。对一些细小的问题，如果有人有兴趣，当然不应轻易地加以干涉或否定。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搞清楚，对于开展党史研究毕竟是有好处的。但是，作为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总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细支末节的研究和考证上面，而应主要致力于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着重探讨党领导革命胜利的规律和特点，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以推动当前的革命和建设更快地前进。1942年毛泽东在介绍当时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党史的方法时曾说：“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①这种方法，我们今天仍然是应该采用的。

党史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党和人民对党史研究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我们每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地处理好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既注意加强党性，又注意加强科学性，把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进一步搞好党史研究，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安徽省委党校《理论战线》1981年10月5日第123期，后收入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

^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目前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极其严重的党史领域开始活跃起来，禁区一个个被打破，颠倒歪曲的历史事实一件件被澄清，很多好的著作、文章、传记、回忆录陆续出版，尊重历史的党史陈列开始恢复和展出，各地的研究会纷纷建立。一些地方流传的“活跃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沉闷的党史”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目前党史研究中的问题还是不少的。由于党史研究遭到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毁灭性的破坏，短时间内有的禁区还不能完全打破，流毒还不能全部肃清。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教条主义、宁“左”勿右等倾向的影响，一时也难以彻底扫除。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少同志仍把党史研究视为“危险地带”，高等学校中一些教师不愿教党史，学生不愿学党史的状况仍然存在；群众中“要学真党史，不要学假党史”的呼声仍然很高；报刊杂志中党史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别的领域为少。因此，一方面要继续破除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设置的禁区，肃清他们的流毒；同时也要进一步扫除过去已经存在的那些错误倾向的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史研究工作便不能进一步顺利地开展起来，“假党史”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